

埃德加·斯诺傳

[美] 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 著

沈蓁 沈永华 许文霞 译



埃德加·斯诺传

EDGAR SNOW A BIOGRAPHY

[美] 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 著

沈 葵 沈永华 许文霞 译

学苑出版社

1199927

**版权所有，除非得到出版者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
或任何理由使用本书的任何章节。本书英文版由美国印
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陈 辉 徐丛华

埃德加·斯诺传

(美) 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著

沈 蕊 沈永华 许文霞 译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4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安徽省合肥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16千字 印数 1-4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0-197-3/G·125 定价：3.80元

谨将此书献给吉娜

由于我的同情心，我的出身和教养，以及我所坚持的原则，我认为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总是站在革命者的一边，如果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没有活不下去的状况就永远不会有革命。

马克·吐温 1906年

革命并非由革命者和他们的宣传所造成。坏的、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造成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情况而导致革命。在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更能动员广大人民去进行有价值的斗争和牺牲，所以他们能取得胜利。

埃德加·斯诺 1955年

致中国读者

埃德加·斯诺一生的基本特色就是：总在尽力理解其他国家，而不是简单地对它们作出判断。这一点也是本书的基调。大多数美国人难以领悟本世纪世界变革的动力，而斯诺的智力特征使他和他的同胞们产生距离。为此，本书不仅是对斯诺长期新闻报道中的中国人或其他国家人民的考察，更主要是对美国的态度和它的对外政策的批判。我希望这本传略能促进美国对世界事务采取更负责的态度。

按照这种精神，本书并不想教导中国人，但中国读者也许能从本书中有所收获。

斯诺是地道的美国人，但他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在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人拉斐德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帮助过美国，斯诺和那些人相似，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出版于一九三七年，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不是“赤匪”，而是纪律严明的革命者。在当时，这不仅对西方国家是重大新闻，对中国本身也一样，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封锁和歪曲有关共产党的报道。后来，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将斯诺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来对待，斯诺在今天的中国人中的声誉远远高于他在美国人中，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由于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受到美国人的诽谤。所以中国读者会有兴趣了解斯诺的一生。

斯诺对理解的追求具有普遍意义。在外交方面，作为双方国家的人民应该寻找共同点，而不是对世界事务的认识总是坚持己见。斯诺成功地沟通了中美双方，使双方消除误会，这是因为他首先自己不抱成见。斯诺和率领美国军队的拉斐德不同，前者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斯诺是新闻记者，不是宣传家，他执著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性格也许是美国人所特有的，但他通过事实寻找真理和希望，设法理解别人，这种追求却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这一点，所有人都可以向斯诺学习。

斯诺是追求理解世界的美国记者，是中国的伟大朋友，如果本书能多少说明这点，或者对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一特点上有所裨益，我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最后，谨向译者表示感谢，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译本能与读者见面。不过，因我的疏漏而在书中出现的不妥之处，当然仍应由我负责。

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

于华盛顿市

英文原版作者致谢

一九七二年埃德加·斯诺去世后不久，我就为撰写本书作准备。但这些年来，由于在国外任记者和在政府部门任职，从而使这一写作计划时断时续。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许多与埃德加·斯诺相识的人帮助了我，有的满足我的采访要求，有的提供大量书面材料，有的提出极宝贵的建议。

在此，我向曾接待我访问和提供资料的人表示衷心感谢。首先要感谢洛伊丝·惠勒·斯诺^①，她虽没有委托我撰写本书，但她如实地答复我的问题，并让我阅读她丈夫的有关文件和资料，我敬佩她对她丈夫和对中美关系所持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感；现已去世的玛丽·希科特也是一位具有坚定信念的妇女，从一开始她就支持并鼓励我撰写本书；海伦·福斯特·斯诺^②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她为我提供详细情况，还和我长谈两次；我还要感谢詹·霍华德·斯诺、米尔德丽德·斯诺、麦克、多萝西·索利兹伯里·戴维斯以及哈里·戴维斯、西尔维娅和威廉·鲍威尔、罗伯特·巴尼特、路易丝和伦道夫·塞勒，还有特鲁地·歇菲。在中国访问时，我约见过一些中国人，但为遵从他们的意愿而未将名字列入致谢名单上，谨在此向他们致以集体的谢意。我感谢中国前外交部长黄华，他与我谈了整整一下午。还要感谢约

翰·爱斯·塞维斯，他是这段历史时期的见证人，他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得到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其中有性格幽默的约翰·苏里凡，他对亚洲情况有广博知识，为我拓宽了调查研究的思路，并对全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意见；查尔斯·亚历山大给我很多指点，还审查了书稿；乔治·克里姆斯基、保罗·内格尔和唐纳德·塞诺对部分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利奥·里布福和霍华德·吉拉特，还有在我早期写作时给予帮助的劳伦斯·马丁，他们在学术研究上为我作了有益的指导；唐纳德·吉林、迈克尔·埃奇特、汤姆·格伦菲尔特、雷彼斯·哈逊、路易丝·蒙可马利和保罗·苏里凡曾帮我解答疑难问题；现已故世的迈克尔·艾德勒生前在关键时刻给我以鼓励，使我不致失误。

书稿档案保存单位的人员也给我很大帮助。特别感谢密苏里一堪萨斯市立大学的埃德加·斯诺档案室，该室虽非研究中国历史资料的中心，但所存资料无论是对一般关心中国问题的、还是特别关心斯诺情况的学者都很有用，该室的玛利林·柏林加姆对我帮助极大。同样，达莫斯学院培根图书馆的肯尼思·克拉默和格里维尔·克拉克档案室、杜鲁门图书馆的本尼迪克斯·左勃里斯特、艾默里大学伍特夫图书馆的林达·马休士也大力相助。还有勃拉·苏里凡，米里姆·迪斯曼和汤姆士多菲。

本书部分章节曾刊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和《密苏里历史评论》上，我感谢这两本杂志的编辑，他们同意转载某些章节，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在和我一起完成本书写作出版计划的人员中，彼得·谢泼得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善于思索，且有耐心，可称得上名符其实的文学作品的代理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社长约翰·高尔曼为本书和我一起工作了几个月，我们已成了朋友。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丽吉娜·汉密尔顿，她虽可做

其他更有得益的事，但她始终不渝地支持我，花许多时间读全部书稿；而我的儿子小汉密尔顿，则表现出他生来就是好样的。

- ① 洛伊丝·惠勒·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位夫人。
- ② 海伦·福斯特·斯诺是其正式姓名，其笔名为尼姆·韦尔斯 (Nym Wales)，但人们常习惯称她为“佩格”或“佩格·斯诺”。1972年后她又多次来华。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英文原版作者致谢	3
○ 引子	1
一 渴望旅行	7
二 决心冒险	18
三 继续行动	40
四 西行漫记	62
五 亚洲风云	94
六 人民这边	122
七 风雨交加	150
八 重返故土	173
九 任重道远	204
十 光荣归去	237
○ 结束语	266

DB48/18

○ 引 子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埃德加·斯诺站在毛泽东身旁，从古老的建筑上眺望北京的中央广场。城楼下，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列队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

这时，斯诺漫长而又非凡的旅行生涯，他那艰辛的人生道路已接近终点。从美国的密苏里开始，他就渴望并追求整个人类也包括自身的独立自由。在以后的旅行生涯中，作为记者他完成了一系列新闻报导的杰出篇章，其中包括在本世纪中对中国形势发展有预见性的著名报导。可是，当美国处于歇斯底里的反共思潮的黑暗笼罩岁月时，斯诺的工作不时遭受挫折与阻挠。也正是由于他的艰辛经历才塑造了这个自称为世界公民的人，而且毫无疑问的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的单独联系之环。

斯诺在中国的国庆之际所站的位置是过去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得到的，那斯诺是怎样得到的呢？而他的历程又能说明作为美国人或世界公民的他对中国有怎样的感受呢？这些正是本书意欲阐述的主题。

查理斯·怀特对埃德加·斯诺的看法虽然不是最全面，但有最接近正确的估价。怀特是内科医生，从小和斯诺都住在密苏里

州堪萨斯城，並都就读于西港中学，甚至有一年夏天，他们还在麦田劳动后同去加利福尼亚州旅行。但中学生活结束后，怀特只见过斯诺一次，也只读过斯诺所写的十来本书中的一、二本。他对斯诺的记者生涯也只是一般了解：如斯诺乘船偷渡到远东；在三十年代成了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权威；在四十年代斯诺作为有名的《星期六晚邮报》的驻外记者，报道过有关苏联、西欧和印度的情况；在严酷的麦卡锡年代中，斯诺被毫无理由地迫害成“非美国人”等等。但怀特对斯诺的评价却较深刻：“你看”，怀特思索一下后对我说，“埃德加不是共产党人，他和我们这些人的生长是一样的。可是，他见多识广！”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一个炎热的星期三，埃德加·斯诺出生在堪萨斯城。当时美国正自信地期待在经济上和道义上成为世界强国。一九七二年斯诺病逝于瑞士一处农舍，这时在越南的长期战争已接近尾声，留给美国人的是他们对误入歧途的惊诧和困惑。

斯诺在那些动乱年代中确实较同辈人见识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许多同辈年轻人到国外只是随意旅行，而他却留驻海外，并不时打破常规，他不靠政府的宣传材料来了解情况，也远离热衷抢新闻的记者群。他是在新生的革命运动中成熟的。这些运动动摇了西方殖民主义，并产生一批新兴国家。斯诺在民族运动中陶冶自己的性情，以浪漫主义笔法描述民族运动，但他仍保持着美国人的个性。而有些人则不同，他们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共同世界面前附炎趋势。斯诺却依然执著地坚持在草原上培育起来的美国故事书中的理想，提高“小人物”的个人尊严，尊重自我决断和称颂由此而来的革命。

斯诺是在近处观察二十世纪的人。第一批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中，斯诺就是其一，他还从血腥味最浓的苏联西部前线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况，在战争结束时他又进入维也纳第一个报道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他目击美苏两国的疏远及以后

演变成全球冷战的过程，他是进入利雅得的第二个外国记者他，也直接报道了印度的独立和一九四八年甘地被刺事件。

在中国，斯诺见得最多。一九三六年他结束了过去十年西方观察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知，撰文介绍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并非国民党所说的“赤匪”，而是农民群众忠实跟随的凝固力量。这个报道不仅在国外，即便在中国也是重大新闻。费正清对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作了正确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本书提供了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包括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活，长征的情况，共产党的游击战略等。各国历史学家和革命者都将此书视作基本读物。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人失败后，斯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近共产党中国。一九六〇年他带着过去的经历作为第一个美国人访问人民中国，他是中国发生文化革命前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名记者，也是第一个回到中国的外国记者。

斯诺积极行动的性格使他深深地涉入外交事务。一九三五年当国民党政府就北方割让问题欲迁就日本时，斯诺帮助北京学生动员社会舆论反对国民党政府。中日交战期间，斯诺帮助推进中国的“工合”^①运动，在运动高潮时组织起一千八百五十个合作社。他在文章中拥护罗斯福和其他领导人，而且还提供私人咨询。一九四九年后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互不来往，斯诺曾设法沟通他们的联系。他强烈反对干预越南，确信这是一场美国人决不会取得光荣胜利的战争。

世界事件的迅速变化也使斯诺犯过记者们常犯的错误，即对各类事件的解释，逐渐受到参与程度的影响，不过他仍是出类拔萃的。文学评论家马克斯韦尔·吉斯科将斯诺列入美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中，这种评价对想写小说和诗歌的斯诺也许是过誉，但他确实将个人报道历史事件这一写作体裁发展到最高峰，他置身于故事叙述中而又使之更有趣也更真实，但却并未因此而

使事实本身失色。他所写的内容比他所用的写作方法更重要，与一般的印象相反，斯诺始终是一个诚实的、进行全面报道的记者，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事件解说员，他不仅设法到其他记者不去的地方采访，而且善于理解他所看到的，并能预见事态的发展。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斯诺比较天真，也许还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国家，可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当然，斯诺的深远影响远超过他一生的具体建树，也超越了他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人对他报道的反映之间存在的矛盾。斯诺记者生涯的前半期，享有盛名，受到各方赞赏。后半生，他的作品竟找不到出路。但人们对斯诺的感情仍是源源不绝、连贯一致的。在斯诺一生的事业中，美国人对待他的作品，犹如对待中国一样，通过多棱镜寄托希望和渴求。三十年代美国人十分担心被卷入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他们热切接受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决心和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在中国领土上抵抗日本侵略的报道。美国人因急于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力量，忽略了斯诺的中国共产党人终究是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的结论，反而从斯诺书中去“证明”中国的“赤色分子”是农民改革者，而非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斯诺对这种片面的理解进行过争辩，但无济于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美国追究谁负“失掉中国”的责任时，人们指责斯诺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错误理解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本质。美国人看到赤色浪潮跨越太平洋诸岛，甚至冲击到美国的本土，认为这一切都是苏联所策划的，因此对斯诺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四九年建立全国政权后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嗤之以鼻。美国领导人对斯诺报道中关于共产党人想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也置若罔闻。事态发展的结果完全证明不是斯诺将美国人引入歧途，而是美国人不信斯诺的见解。

人们对斯诺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有些还是很歪曲的，这在

“左”派力量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每月评论》的编辑李欧·荷勃曼，在这份自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刊物上说斯诺是一个“想当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毛泽东认为斯诺是布尔乔亚；美国共产党给斯诺扣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当《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该党是唯一发表强烈批评的组织。在右派势力方面，理查德·尼克松和其他人一起，称斯诺为机会主义分子，是共产党人的工具，尼克松在国会设置“毒饵”，最后迫使斯诺离开美国；不过，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历史性访问中国前夕写信给斯诺，赞扬他的“卓越业绩”，这时的斯诺已在瑞士身患癌症，生命垂危。

这一切并不是说斯诺乐于成为争议人物。他不是那种折磨自己灵魂或者到处树敌的悲剧人物，即使那些最厉害的批评者虽谴责斯诺为共产党人宣传，但也承认喜欢斯诺，《星期六晚邮报》的一名编辑曾说过“埃德加是这样的一个记者，我可以带他到我家见我母亲”。斯诺不爱虚荣，也不自负，年轻时离开密苏里到纽约去时，他不效仿所谓绅士风度去戴上高礼帽和拿上手杖，也不学当时用中间姓名称呼的时髦做法。

斯诺喜欢冒险生涯，往往一时冲动便去做冒险的事，但即便在青年时代他也不是一个怪癖的粗野之辈。当他和约翰·里特临去俄国前，约翰在纽约福尔顿街码头狂欢到深夜，而斯诺却独自徘徊思索着即将进行的远航。

斯诺不习惯、也最讨厌在大庭广众面前摆架子，他生来不是喋喋不休、自以为是或自私自利的人。每当有人和他的夫人佩格·斯诺进行热烈争辩时，斯诺总是悄悄溜走；当代有些记者，例如斯诺所爱戴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或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们在雄辩中得到成长；但斯诺则不同，他年轻时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他曾做过天主教祭坛侍者，后来，逐渐不信天主教，但因为母亲是虔诚的教徒，所以直到他离家前总是去教堂做弥撒，他是那样一种男孩，可以陪长姐米尔德丽德在离家不远的杰克·奥·

莱登饮食店跳舞。但在五十年代，同事们认为斯诺顽固得象一头密苏里的骡子，因为当时他宁可失去《星期六晚邮报》的职位，也不愿写缺少争论内容的文章，他要求美国人能听听他的意见。

查理斯·怀特认为斯诺养成这样的性格，主要在于他非凡的旅行中所看到的东两，同时与他的出身也有关。斯诺的青年时期并不存在什么因素可决定他将来的伟大或成为争议的人物，但他的出生背景和年轻时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他的一生。有一位朋友认为斯诺是成熟的，并写下这样的话：

“因为斯诺总是不忘他是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
- ① 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人于1938年开始创办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为“工合”。